

基于库普尔“八问方案”的中国语保工程研究



徐君颐^{1,*}, 周晨亮²

¹浙江大学文学院, 浙江杭州 310058

²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杭州 310058

摘要: Cooper 八问方案是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领域的经典理论。本文借助这一框架回顾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至今的实施情况, 认为其在语言保存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 而活态保护及文化传承工作仍待进一步展开。为深入推进语保工作, 应首先明确以下两点: ①语言是一种生态系统, 不能孤立、静止地看待其中各元素, 需要发挥“人”的核心调节功能; ②“科学保护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与“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可以齐头并进, 关键在于科学划分不同语言、方言的功能区域, 将私人语言环境作为“母语栖息地”。当下,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削弱了非通用语的交际功能,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用语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声望。有鉴于此, 应该平衡地区经济发展、开发地方特色文化, 以提升当地民众对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使命感。唯有政府、专家和广大群众共同参与语言保护, 才能建立和谐稳定的语言生态系统, 实现对语言资源的有生开发和利用。

关键词: “八问方案”;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语言生态系统; 功能域; 文化自信

DOI: 10.57237/j.cll.2022.02.001

An Analysis of the Project of Protecting Chinese Language Resources Using Cooper's Accounting Scheme

Junyi Xu^{1,*}, Chenliang Zhou²

¹School of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²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tilized Cooper's accounting scheme to analyze the policy of “the Project of Protecting Chinese Language Resources” or Yubao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or 语保) to date. We suggest that the project has achieved outstanding effect on preserving Chinese regional varieties, while further work on living language protec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is still in progress. In order to further implement the language protection project, we contend that: (1) humans are at the core of the linguistic ecosystem, and each element is not isolated or static; (2) “the Scientific Protection of the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of All Nationalities” can synchronize 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The key lies in scientifically devising the functional division of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dialects. In the recent decades,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as weakened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local dialects and, to some extent,

*通信作者: 徐君颐, 12004022@zju.edu.cn

affected the prestige and the cultures they represent. It is advocated that public confidence in local culture should be boosted through balancing regional economy and developing distinctive cultures, so that citizens can spontaneously become a living force in the inheritance of their mother tongue and culture.

Keywords: Cooper's Accounting Scheme; The Project of Protecting Chinese Language Resources; Linguistic Ecosystem; Functional Domain; Cultural Confidence

1 引言

鉴于我国语言资源的重要价值和存续危机，党和政府对语言资源保护工作予以高度重视。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语保工程），这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规模的语言资源保护项目。2019年，语保工程一期建设顺利收官，语言保存工作成效突出；2021年，语保工程二期建设开始推进，对语言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利用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任务。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是语言规划成功实践的典型案例，分析这一案例，有助于我们更动态且具体地把握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学科理论，并能反哺于社会实践。美国语言学家 Cooper 概括了语言规划学者的四大任务：描述语言规划、预测语言规划、解释某些特别案例的语言规划过程与结果，以及根据这些过程与结果进行有效的归纳；并为语言规划研究给出了一个细化的理论框架，即著名的“八问方案”。[1 (p. 46)] 在本文中，我们将借助这一框架对语保工程进行考察，作出描述和解释。

在下面一节，我们会首先对语言规划及“八问方案”进行简要介绍，然后以“八问方案”为框架描写我国语保工程的概况。我们不揣冒昧，将在第三节中进一步分析以下两个问题：①目前语保工作尚存何种未竟之功，应该如何加以完善？②应如何保障“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两项政策齐头并进？

2 “八问方案”框架下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2.1 语言规划与 Cooper“八问方案”

尽管语言规划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中存在已久，首次得到明确定义和系统分析还是由 Haugen 于 1959 年提出：语言规划是一种准备规范的正字法、语法和词典的活动，旨在指导非同质言语社区中的书面和口头

语言应用。[2]

1989年，Cooper 给出了自己的定义：语言规划指的是有意识去影响他人语言行为的努力，包括习得、结构和功能分配等方面[1 (p. 45)]。Cooper 为语言规划研究提供了一个细化的理论框架，即“八问方案”[1 (pp. 97-98)]，内容包括：(1) 什么样的参与者 (what actors)；(2) 试图影响什么语言行为 (attempt to influence what behaviors)；(3) 什么人的语言行为 (of which people)；(4) 为了什么目的 (for what ends)；(5) 在什么条件下 (under what conditions)；(6) 采用什么手段 (by what means)；(7) 通过什么决策制定过程 (through what decision-making process)；(8) 带来什么效果 (with what effect)。该框架有助于语言规划学者的描述、预测、解释、归纳工作，并能助其评价自身任务的执行情况。Bastardas-Boada 指出，语言规划研究存在视角破碎的危险；“八问方案”则综合借鉴了创新推广、营销策略、政治发展和决策制定等多领域的理论框架，形成了语言规划研究的解释性理论体系。[3]

国内外皆不乏基于“八问方案”的理论和应用研究。Spolsky 和 Shohamy 从多学科视角（社会语言学与语言规划、政治学与政策研究以及教育与教育语言学）对“八问方案”进行概括性解释，尝试对其中除目的、手段外的六个问题作出解答[4]；Ager 将“八问方案”中的“为了什么目的”分解为动机、态度及目标三个方面，三者组成了语言规划的动机过程[5]。Zhao 和 Baldauf 借助“八问方案”对比分析了 1986 年前后中国汉字规划活动的异同[6]；Pan 等同样以“八问方案”为框架，梳理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汉字简化运动。[7]

王辉认为，“八问方案”列出的八个变量是语言政策与规划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有利于从多个角度理解语言规划行为。[8]诚然，尽管如 Moore 所批评的，“八问方案”仅是对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纯粹描述性图示概要[9]，但在这一学科的理论框架均无法超越描述性

阶段时, Cooper 的“八问方案”仍不失为一个可靠的抓手, 帮助我们决定哪些信息值得描述、预测和解释, 并由此尝试发现语言规划行为的规律。

2.2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概况

基于以上考量, 我们利用 Cooper“八问方案”对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进行了梳理, 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八问方案”框架下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

问题	信息	备注
什么样的参与者 what actors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受党和国家重视: 十八大、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精神;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 2. 受教育部、国家语委主管, 并采用自上而下的分层组织管理模式 3. 国家统一规划, 专家和地方共同组织实施, 鼓励社会参与 	
试图影响什么语言行为 attempt to influence what behaviors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对象: 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语言文化的实态语料 2. 特征: 需要保护, 处于即将消亡/濒危中/有衰落倾向/仍具有活力 3. 目标: 对症下药, 进行保存/抢救/增加活力/保持活力[10]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语言保护”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前者指保持语言、方言活力以使其持续生存和发展, 后者还包括语言保存与展示; 语保工程之“保护”即取广义[11] 2. 从实际措施看, 目前工作主要围绕调查保存展开, 开发应用则属后续任务
什么人的语言行为 of which people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目标人群: 我国各民族人民; 其中语言保存主要由学术界承担, 保护工作依靠政府政策和大众行动 2. 目标人群态度: 国家政策日益完善; 学者个人兴趣未必吻合国家当前需求; 民众逐渐弃用母语(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削弱了非通用语的交际功能,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用语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声望)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语言学者应树立“学术为社会服务”的理念, 自觉让自己的研究工作服务于社会问题的解决[11] 2. 平衡经济发展、开发特色文化, 唤起民众对当地文化的自信心和使命感
为了什么目的 for what ends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显性目的: 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 收集记录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语言文化的实态语料, 通过科学整理和加工, 建成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 并开展语言资源保护研究工作, 形成系统的基础性成果, 进而推进深度开发应用, 全面提升我国语言资源保护和利用水平 2. 隐性目的: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安全服务[12] 	
在什么条件下 under what conditions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政治条件: 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十八大报告、《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等文件为语保工程提供了政策支持 2. 国际环境: 语言濒危是世界性问题, 保护发展语言文化多样性已经成为联合国和各国各地区普遍重视的问题 3. 实践经验: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中国语言资源联盟和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等机构和项目的建设, 语保工程即是对原有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的进一步扩充和整合 4. 理论基础: 邱质朴[13]首次在国内讨论了语言资源问题, 而后张普[14]、李宇明[15]、徐大明[16]等学者都在文章中阐明了语言的资源价值 	
采用什么手段 by what means	国家统一规划, 专家和地方共同组织实施, 并且鼓励社会参与	体现了国家工程、社会化和科学性这三重定位[11]
通过什么决策制定过程 through what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理论依据: 20世纪80年代以来, 随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 语言濒危问题越发受到国际语言学界关注; 邱质朴首先将“语言资源”这一术语引入国内, 而后张普、李宇明、徐大明等学者相继在文章中论述了语言作为一种资源的价值 2. 政策支撑: 2007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 “重视语言资源的保护及开发利用是基本工作原则之一”; 2011年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 “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 “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17]; 《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将“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列为主要任务, 强调重点开展语言国情调查、各民族语言文字科学记录和保存、少数民族濒危语 	

问题	信息	备注
	言抢救和保护等工作。	
带来什么效果 with what effect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截至 2019 年语保工程一期建设收官时， 田野调查：共完成 1712 个调查点的语言资源调查，超出预定计划 14.13%； 数据采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采集展示平台新增音频、视频数据共约 350 万条，新增调查点 654 个、发音人 3377 位； 学术研究：《语言战略研究》杂志 2019 年第 3 期的“语言资源保护”专辑，《语言文字应用》杂志 2019 年第 4 期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专栏等； 标志成果：《中国语言文化典藏》《中国濒危语言志》入选“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际影响：2018 年 9 月，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在湖南长沙召开；次年 2 月，正式发布会议成果性文件《岳麓宣言》，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声音、贡献了中国智慧。 2021 年 4 月，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建设推进会部署了语保工程二期建设工作；同年 8 月，《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二期建设规划（2021—2025 年）》将深度开发利用语言资源作为核心任务。 	

3 结论

回顾第二节中对 Cooper 八问的回答，我们可以知道，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主旨是保护我国各民族语言文字（特别是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并由此传承和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两个问题：①对照语保工程的目标和手段，我们发现当前语保工作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濒危语言的保存上，保护与传承工作尚未展开。语言保护及传承的暂时缺位可能对语言资源保护的成效造成何种影响？后期应如何推进相关工作？②语保工程的施行对象主要是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实施主体则以国家权威机关为主，这是否会与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基本国策相冲突？以下，通过分析这两个问题，我们将对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实践和意义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3.1 构建由人调节的语言生态系统

周庆生总结了我国当前开展的四类语言保护措施：一是语言资源保存、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抢救措施；二是一般语言文化遗产保存措施；三是优秀语言文化遗产保护措施；四是语言使用权利保障措施。[18]就工作内容来看，语保工程已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语言保存方面，保护传承工作则尚未展开。戴庆厦指出，尽管语言材料的收集和积累是语言资源保护的基础，但仅有这些材料还不足以对衰退或濒危的语言起到根本性的保护，应该在语言教育、文化传承、传媒应用等方面采取措施以增强语言活力，达到保护语言使用功能这一根本性目的。[19]

语保工作是否重视活态传承原则、具体采取何种

保护措施，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语言。长久以来，我们将语言视作一种实现交流的工具；Jernudd 和 Gupta 将语言作为资源进行论述[20]，而后，国内外学者均对语言的资源性作出了阐释：Fishman 将语言称为“一种特殊的资源”[21]；Ruiz 提出了影响语言规划的三种取向，即语言作为问题、语言作为权利和语言作为资源[22]；国内学者中，邱质朴首次在国内使用“语言资源”这一术语，从信息化、语言教学、语言规划等角度讨论了语言资源开发、语言工程和汉语国际推广等问题[13]，而后张普[14]、李宇明[15]、徐大明[16]等都阐明了语言的资源价值。可以认为，语言作为一种资源的观念已经在学界建立起来。仍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语言资源的有用性在更大范围得到认知，从而为语言资源保护引入更广泛的有生力量。

对一般民众而言，对语言资源有用性的理论论述不能够代替其经验感知，因而还需特别注意语言资源价值的公众宣传。刘海涛指出了语言“交际的工具、文化的容器、身份的象征”这三种功能[23]，刘海涛又将其扩充至“交际的工具、文化的容器、身份的象征、知识的载体、心智的窗口、思维的手段和国家的资源”七个维度[24]。语言实现交流、承载文化、标志身份等功能是日常生活中直接可感的，这是人们使用语言的主要动因。而在当下，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加快了人口流动，通讯手段的进步使跨区域交流变得十分便捷，原先稳定的语言社区趋于碎片化，在更大范围内通行的语言取代了母语的首要交流工具地位，经济性原则又决定了人们不会额外学习、巩固一门并非最为常用的语言或方言。同时，地区经济的发展程度为文化价值在普罗大众心中进行了新的排序。社会调查显示，广东大学生对普通话和粤语的评价无显著差异，江西大学生对普通话的评价则显著高于

赣语,体现了地区经济水平和区域语言态度的正相关性。[25]许多学者将这样“近乡音而情怯”的文化心理归结为当地人的“认知偏差”,暗含了应该对其予以纠正的主张;然而,这些微妙复杂的心态并非无端产生,也不是不可理喻的,恐怕不能简单祛除。要想提高较弱势语言的声望,还需从经济根源着手,改善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国外有过这样的实践先例:爱尔兰 Gaeltacht 地区为阻止人口移出以保障语言传承,专门设立了一些机构发展地区经济;为了创造有利于爱尔兰语代际传承的城市环境,政府还在都柏林专门规划了两个城市发展项目,以便爱尔兰语者能够日常接触[1 (p. 158)]。此外,还应加大力度开发地方特色文化,以具体化、产业化等手段增强其流通性和流行性,由此提振当地民众对本土文化的信心,激发其传承与弘扬母语文化的荣誉感和责任意识。

发展经济、弘扬文化,这些都是为保障语保工程的群众基础不能不进行的重要工作。“社会化”是我国语保工程的三大定位之一,这既是由于许多群众的相关知识和专业技能并不逊于专门工作人员,也考虑到语保工作的繁重性、人力物力的紧缺性和时间要求的迫切性。从语言规划行为本身的逻辑来说,规划实施的成功离不开普通群众的配合,只有当这一广大群体认为本次规划符合自身利益,才有可能参与其中[1 (p. 83)]。由此观之,一项科学而可持续的语言规划离不开自下而上的策略,需要注重适宜人文环境的培养。

语言是一件交际工具,一种社会资源,更是一个“生态系统”[26 (p. 289)]。任何元素在其中都不是孤立的,也不是静止的,因而要遵循活态传承原则,注意底层环境培养。我国语保工程的工作对象是各民族语言及文化,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语言确是文化的良导体,反之,文化更是语言赖以存续的生命之源。只有树立好本土文化自信,才能够动员起广大群众力量,从而实现“人”这一核心元素对语言生态系统的积极调节作用,保障语言资源的有生开发和利用。

3.2 科学划分不同语言的功能域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对于“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面临生存危机”的因果叙事。经过以上讨论,不难澄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可与保护我国语言资源齐头并进。

如上文 3.1 所述,语言的功能不限于实现人际交流,还能够作为文化的载体、身份的标志。尽管交际需求

的变化压缩了地方用语的使用场景,但并不至于取缔其生存空间。Fishman 指出,一种弱势语言只要在家庭等私人领域占有主导地位,就可以生存和发展下去,而不必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27];与之相映,国内学者陈保亚认为普通话在社会语言环境中拥有强大语势和通用作用,应该将家庭语言环境作为传承母语的最后家园[28]。如今,众多语言资源面临存续危机,正是由于人们在全场景下放弃使用母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我们再一次强调,这种放弃是基于现实根由的,不能一味批评或要求其自我纠正。只是从客观现象来说,“母语栖息地”的“红线”被突破了,弱势语言在家庭生活等私人语言环境的失守最终导向了语言资源的危机。因而,重视私人语境作为“母语栖息地”的语言生态价值,保护甚至鼓励在家庭等私人交流场合使用母语,这是在推广通用语的环境下保障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永续发展的必要手段。

事实上,非通用语在私人语境中有着很好的生存发展机会,因为人既有归属于某一群体的需求,也有标明自身身份特异性的心理需要[29]。不但地域方言具有身份标志和情感纽带功能,人们自发形成的文化社群中也会孕育出独属于这一群体的社会方言,如风行于 2008 年前后的“火星文”,以及近期风靡网络社交平台的“抽象话”等。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语境中的“黑话”反映了各亚文化群体寻求归属与特立独行并存的精神需要,也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对“方言”的需求根植于自身的精神文化价值追求,不会因具备通语能力而消亡。

Cooper 指出,地位规划就是为影响社群各种语言的功能分配所做的刻意努力。[1 (p. 99)]语言接触必然导致竞争,我们不能逆转社会发展趋势,也不可能隔绝语言间的接触。因而,完善语言地位规划,科学划分各语言、方言的功能域,保障“母语栖息地红线”不被突破,是在当前发展形势和语言政策下持续保护语言资源的可行之策。

4 总结

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于 2015 年启动,并于 2019 年完成一期建设,于 2021 年启动二期工程。借助 Cooper 的“八问方案”,我们回顾了语保工程实施至今所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认为其在保存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及口头语言文化的实态语料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与之相对,活态保护和文化遗产工作有待进一步开展。

语保工程保存的是语言，传承的是文化，根本上都立足于“人”。人的使用为语言赋能，使之由一种纯粹的材料成为一种有用的资源；故而语言保护不能不注重维持语言的“有用性”，语言资源的存续必须在人的使用当中实现。应支持并鼓励人们在私人交流环境使用非通用语，保障各语言功能域得到更科学的划分。一项理想的语言保护规划不应限于机械论，而要将语言视作一种复杂的生态系统；在此之中，人占据着核心地位，促成语言演变并能调节变化方向；文化需求则能驱动人们改变语言状态，因而是语言保护更加深远的力量。一时一地的文化自信维系着母语生态的和谐稳定，各地切实树立的文化自信终将汇成举国文化自信建设的胜利。

参考文献

- [1] Cooper R L.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2] Haugen E. Planning for a Standard Language in Modern Norway [J].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959, 1 (3): 8–21.
- [3] Bastardas-Boada A.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Towards a Complexity Approach [J].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13, 14 (3–04): 363–381.
- [4] Spolsky B, Shohamy E G. *The Languages of Israel: Policy, Ideology, and Practice* [M]. Buffalo: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9.
- [5] Ager D E. *Motivation 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M].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1.
- [6] Zhao S, Baldauf R B. *Planning Chinese Characters: Reaction, Evolution or Revolution?* [M]. Boston, MA: Springer US, 2008.
- [7] Pan X, Jin H, Liu H. Motives for Chinese Script Simplification [J]. *Language Problems and Language Planning*, 2015, 39 (1): 1–32.
- [8] 王辉. 语言规划研究 50 年 [J]. *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3, 14 (6): 16–22.
- [9] Moore H. Language Policies as Virtual Reality: Two Australian Examples [J]. *TESOL Quarterly*, 1996, 30 (3): 473–497.
- [10] 李宇明. 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2 (2): 13–15.
- [11] 曹志耘.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定位、目标与任务 [J]. *语言文字应用*, 2015 (4): 10–17.
-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国家语委. 教育部 国家语委关于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通知: 教语信 [2015]2 号 [Z] (2015) [2022–04–29].
- [13] 邱质朴. 试论语言资源的开发——兼论汉语面向世界问题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1 (3): 111–123.
- [14] 张普. 论国家语言资源 [C]//民族语言文字信息技术研究——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国中文信息学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专委会, 2007: 214–226.
- [15] 李宇明. 语言资源观及中国语言普查 [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1): 5–7.
- [16] 徐大明. 语言资源管理规划及语言资源议题 [J]. *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1): 12–15 [2022–04–29].
- [17] 胡锦涛.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N/OL]. *人民日报*, 2012: 001 [2022–04–29].
- [18] 周庆生. 我国语言保护工作的原则和措施 [N]. *语言文字报*, 2020: 002.
- [19] 戴庆厦. 《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的理论与实践——《语言保护》实施后的五年回顾 [J]. *贵州民族研究*, 2017, 38 (02): 185–188.
- [20] Jernudd B H, Gupta J D. *Towards a Theory of Language Planning* [M]. Jernudd B H, Rubin J, eds.//*Can Language Be Planne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1: 185–204.
- [21] Fishman J A. Language Modernization and Planning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 Types of N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Planning [J]. *Language in Society*, 1973, 2 (1): 23–43.
- [22] Ru ǎ R.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Planning [J]. *NABE Journal*, 1984, 8 (2): 15–34.
- [23] 刘海涛. 语言规划的生态观——兼评《语言规划:从实践到理论》 [J]. *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06): 51–57.
- [24] 刘海涛. 国家安全视域下的语言问题 [J]. *中国外语*, 2021, 18 (06): 1+10-16.
- [25] 宫同喜. 语言领域、语言能力与方言保护 [J]. *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12 (3): 17–22.
- [26] 卡普兰, 巴尔道夫. 语言规划: 从实践到理论 [M]. 郭龙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27] Fishman J A. *Societal Bilingualism: Stable and Transitional* [M]//*Language in Sociocultural Chang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135–152.
- [28] 陈保亚. 家庭语言环境:传承母语的最后家园 [J]. *语言战略研究*, 2017, 2 (6): 81.
- [29] 陈佳璇. 《火星文》: 网络语言的新发展 [J]. *修辞学习*, 2008 (04): 41–46.